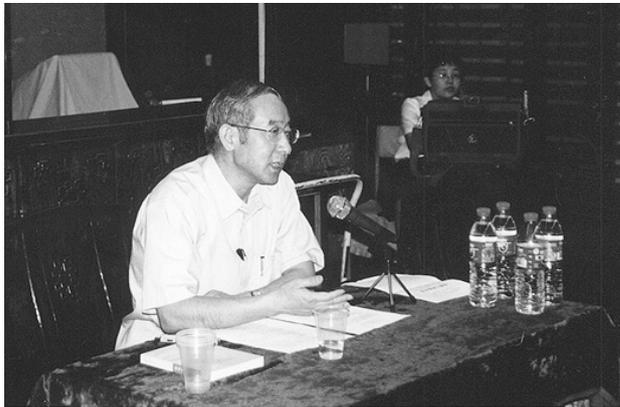


大学者，小文章

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 柴剑虹

我想首先转达我的老师启功先生——也是这个讲座的讲课者之一——对讲座的期望。他让我讲两句话：一句话是谢谢高校古委会和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举办这样的报告会，让他有机会与广大读者交流；第二句话，是他希望这样的交流更深入、更扩大。

我们讲座的题目是“典籍与文化”。典籍、文化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，需要交流，需要传播。国家图书馆之所以有生命力，是因为她的典籍为大家所用。有大家支持，我们的讲座才有生命力。文化传播的方式很多，讲座是其中之一，目的就是普及文化。大家都知道敦煌，每年到敦煌去的人很多。有位作家写了本书，讲到一个想象，说日本的旅游者到敦煌去参观，每人都有一本日文书，什么洞窟是什么内容，日本的参观者都看得很好，很高兴。



但中国的参观者就没有这样的手册，因为敦煌研究院长期以来就没有做这个普及工作。哪个洞窟对公众开放了，这个洞窟是什么内容，光靠讲解员讲几句话是不解决问题的，所以很多中国观众看后，就说看不懂，也没什么意思。我知道国外博物馆讲解很尽职，而且不光有讲解，还有说明书，图片的、文字的，

都在那里放着，这就是文化的传播、知识的传播，是需要普及的一面。普及是提高的基础，没有普及，哪里谈得到发展呢？李致忠先生讲他是在听一个讲座后，决定了他的研究方向，他成为了国家最好的版本专家。那么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普及，怎么来培养我们的专家呢？我们的文化也不可能发展。欧洲的汉学家，现在也面临着困惑和危机。我在法兰西学院做过一次演讲，讲到这个问题。因为欧洲过去的大汉学家汉学功底都比较好，现在由于普及工作不如过去，虽然他们对中国文化也很关注，但他们培养更好的汉学家也存在着很多困难。如果欧洲的广大读者、百姓能对中国文化了解得更多一些、更好一些，他们会培养更好、更多、

更出色的汉学家。所以江泽民同志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讲了一句话，说：“不了解中国的过去，很难理解中国的现在。”在国外也有这个问题，他们对中国的当代、近代比较关注，而不太关注中国古代的东西，所以研究古代中国存在着经费不足、图书不足的问题，我国也存在类似现象。

现在国家图书馆和高校古委会合作举办典籍文化讲座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。这种传播、这种跟读者的直接交流，也对搞学术研究的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因为每位演讲者都很难做到象王尧先生那样讲得生动、讲得深入浅出，但听众要求我们这样去做，这样做的好处譬如大专家写小文章。我过去编《文史知识》杂志 11 年，编写这个杂志有一条宗旨，就是大专家写小文章。大专家写小文章非常重要。如果小文章都没有大专家来写，那么就会出现目前社会上的一个现象，一些知识的宣传不够准确，或是错误的。实际上现在的大众传媒对中国文化的宣传并不少。大家到书店去看，各式各样的书很多，挂着普及招牌的书也很多，那是些什么普及读物呢？我自己是当编辑的，我很惭愧，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书有很多错误的知识，有很多伪科学的东西，现在在那里传播着，非常危险。我曾经和学术界的朋友开玩笑说，学术上容许胡说八道，因为学术上的胡说八道一点都不可怕，有人去驳你，有人去跟你辩论，但普及的胡说八道就很可怕、很危险，因为看你这些胡说八道的都是一些知识层次比较低、渴望并需要知识的人，有的甚至是年龄比较小的。他们被灌输了这些伪科学的东西、错误的东西，是要影响一辈子的，非常可怕。我和中央电视台的同志也讲过这个问题，他们做了很多好工作，但也有些工作做得不好，比如他们对楼兰、吐鲁番、敦煌的介绍，有些是错误的，属于那种媒体炒作的东西。我不反对炒作，但我反对错误的炒作。楼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电视里讲的很糟糕。中央电视台搞过一个节目，是探索大海盗的，结果把海盗和敦煌、楼兰混为一谈，给大家一个非常错误的信息，这是需要高度警惕的。我认为这个典籍文化讲座非常好，就是把真实的、确定的知识同大家作交流，不是说学者讲得百分之百正确，但是一个专家学者要负责任，要有学术的良心，他凭着这个良心去讲，并欢迎读者交流。俄罗斯的满文专家不少，从满文基础知识来讲，搞得比较扎实，而我们对基础的东西都还不够重视，我们的历史课和历史教材还存在着一些问题。作为一个讲座的参加者，我也要求自己把所知道的老老实实告诉大家，不知道的也老老实实向听众求教，希望讲座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。我们不反对更多的形式、更多的传媒，但一定要保持这个典籍与文化讲座的特点、特色和纯洁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了这个特色和纯洁性，讲座就有生命力。